

# 马鹤天与抗战时期榆林中国边疆学会

王志平

**提 要：**抗日战争时期，马鹤天在陕西榆林领衔创设的中国边疆学会，是20世纪40年代前后形成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高潮的体现。榆林中国边疆学会创设时制定的研究规划，特别是关注西北和华北边疆问题的研究，以及形成的独特的学术志趣，拓展了20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边疆研究的广度，是完善这一时期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该学术团体的学术活动及学术成就有强烈的历史现实性，呈现出独特的学术特点和学术影响，其遗世的方志类成果，为当代史志编纂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关键词：**马鹤天 中国边疆学会 陕西榆林 抗日战争时期

1940年8月，在晋陕绥抗日前线重镇陕西榆林，曾出现过有一个有官方背景的边疆研究团体，即由当时国民政府驻榆林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特派员马鹤天领衔创设的中国边疆学会。因该学会与1940年7月赵守钰等于重庆创设的中国边疆学会，以及1941年3月顾颉刚等于成都创设的中国边疆学会同名，1941年6月，3个边疆学会合并，在重庆设中国边疆学会总会，在成都设四川分会，在榆林设陕西分会。1942年3月，榆林中国边疆学会正式改称为中国边疆学会陕西分会（下文简称榆林边疆学会），至1946年7月马鹤天率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迁张家口，榆林边疆学会重心迁西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自然解体。关于马鹤天创设的中国边疆学会在榆林的学术活动及其传世成果，目前学术界几无涉及，地方史志亦无所载，本文就此作一初步考述。

## 一

近代中国边患频发，在内忧外患压力推动下，中国边疆研究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出现了新的高潮。在这种学术氛围中，马鹤天就任国民政府驻榆林的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特派员，这种官学双重身份使其具备了组织边疆研究的主观动机，当时榆林汇集大批蒙汉上层人士和学术人士，这也为其组织边疆研究提供了研究主体。

马鹤天（1887—1962），山西省芮城县古仁村人，名鸣鸾，字鹤天，以字行世。他早年受私塾教育，曾得中秀才，民国2年（1913）赴日留学，民国7年回国，次年春参与创立山西国民师范学校并任教务长，不久赴北平任民国大学教授兼总务长，后出任西北边防督办公署教育科长，曾掌甘肃教育厅，兼兰州中山大学（后兰州大学）校长，民国19年参与组织新亚细亚学会，任会刊《新亚细亚》月刊编辑；民国25年任国民政府护送九世班禅回藏专使行署参赞，民国28年任国民政府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特派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研究员等。<sup>①</sup>

马鹤天是民国时期较早关注边疆问题的学者之一。民国12、13年（1923、1924）在北平时，他即决意考察和研究边疆，并于民国14年冬，历张家口至甘肃，沿途考察内蒙古人民生活情形；次年秋，他深入内外蒙古和苏联考察，考察成果后汇集为《内外蒙古考察日记》和《苏

<sup>①</sup> 参见马鹤天著，刘铁程等编：《万里筹边》，“引言”，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7页。

联考察记》刊行<sup>①</sup>；民国16年9—11月，他以甘肃省代表身份赴青海，参与主持祭海典礼，此次经历以《青海视察记》为题在《新亚细亚》刊行。从民国17年开始，他将视野扩展至整个中国边疆地区，民国18年夏，参加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生班考察团赴东北考察，归来撰写《东北考察记》。<sup>②</sup>民国24年他任护送九世班禅入藏专使行署参赞，得到考察西藏的机会，但因各种因素制约，九世班禅一行滞留于甘、青、川一带，后班禅于途中圆寂，马鹤天转任护枢专使。西藏之行前后辗转3年，于西藏（当地）情况非见即闻，所得成果后来综合成《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刊行。<sup>③</sup>早年的学术志趣及边疆考察活动，使马鹤天具备了组织边疆研究的主观动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等公开投降日本，并在张家口成立伪政权。为监视德王的活动并搜集情报，民国28年（1939），国民党中常会议定设立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负责这项工作，并决定公署驻榆林。经孔祥熙推荐，马鹤天被任命为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察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于当年7月1日在重庆组建，不久所属人员分批出发，于12月下旬到达榆林，先驻城南韦家梁村，后入驻城内洪济寺，并按既定任务展开工作。

时榆林和绥远伊克昭盟（伊盟）及周边，驻有邓宝珊为首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所部，还驻有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及其他部队。出于安抚蒙古族上层和团结蒙古族共同抗日的需要，从民国27年（1938）春开始，国民政府将绥远省境内蒙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从归绥迁至榆林，又在榆林设立了绥远省伊克昭盟蒙旗宣慰使公署（伊盟宣慰使公署），使绥蒙各地的蒙古族上层人士和文化人士以及大批青年聚集榆林。<sup>④</sup>民国29年，“五原大捷”迟滞了日本的进攻，伊盟及榆林形势有了缓和，马鹤天便萌发组织一个边疆问题研究学术团体的想法。在得到榆林当局邓宝珊、朱绶光、马占山、高双成等人同意后，于当年8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中国边疆学会。榆林边疆学会首次会议议定，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长官傅作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朱绶和绥境蒙政会委员长沙克都尔扎布（沙王，时为伊盟札萨克旗札萨克兼伊盟盟长）为名誉理事长，马鹤天亲任理事长，晋陕绥边区所属22军86师参谋长徐之佳和绥境蒙政会委员兼国立伊盟中学校长经天禄为副理事长。<sup>⑤</sup>榆林边疆学会的核心会员先后有曹颖僧、曾庆锡、黎圣伦、史念海、邹焕宇、谢再善、陈国钧、胡凤山、张施武、任秉钧、王九皋等，他们多为学者，如曹颖僧曾留学日本并对陕北史地及西夏历史颇有研究，史念海后成为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谢再善后执教国立西北大学边政系，陈国钧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荷兰海牙社会研究院并曾在相关大学任教，他们均为榆林边疆学会的学术骨干。

## 二

榆林边疆学会驻榆林6年（1940年8月至1946年7月），在马鹤天的带领和推动下，组织开展了一系列边疆研究学术活动。如何评价20世纪40年代前后一批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边疆问题研究团体及其研究活动，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马大正认为，当时“成立官办团体的首要目的是要为

① 参见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新亚细亚学会，1932年；马鹤天：《苏联考察记》，刘铁程等编：《万里筹边》，第189—216页。

② 参见马鹤天《东北考察记》，新亚细亚学会，1934年；刘铁程等编：《万里筹边》，第163—177页。

③ 参见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

④ 参见王志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驻榆林三个蒙古族工作机构考述》，《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1期。

⑤ 参见《中国边疆学会昨开成立大会》，《陕北日报》1940年8月2日，第2版；《为研究边疆问题适应抗建工作——中国边疆学会前日正式成立》，《陕北日报》1940年8月3日，第2版。

现政权的统治服务的，而显然当时的政府并未选对一条能使中国繁荣昌盛的正确之路；但也不能讲其每一具体举措都是不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其边疆安全与发展的。因此，对于这些团体的作用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sup>①</sup>。所以，尽管马鹤天组织的榆林边疆学会确有官方背景，但在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的历史现实中，这一学术研究团体应该发挥了一定作用。

从其参与人员构成来分析，主要成员均任职于当时与蒙古族相关的机构，他们的研究直接为其工作服务，体现出研究贴近现实需求的特点。从其政治支持分析，当时榆林各种政治力量并存，主要有国民党的军事系统和行政系统、地方军事系统和少数民族上层系统，还有中国共产党及陕甘宁边区的影响。当时榆林的多种政治力量，在邓宝珊全力维持下，基本上以团结抗战为根本遵循，体现出团结抗战的精神理念，这构成了马鹤天及榆林边疆学会进行边疆问题研究的政治支持，契合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历史趋势。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榆林边疆学会所处的地域因素，形成了当时中国边疆学会总会及各分会研究的自然分工，重庆总会和四川分会多关注西南东南边疆方向，而榆林边疆学会则是处在抗日前线，主要关注华北西北边疆方向，特别是内蒙古方向，显示了榆林边疆学会独特的学术地位。

榆林边疆学会成立后不久，即创办会刊《边疆》月刊，其《创刊词》提出，讨论边疆问题不应局限于政治、军事，应进一步引申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边缘”来认识。<sup>②</sup>可见，当时榆林边疆学会注意了对边疆问题的文化审视。在之后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上，通过了与边疆文化问题相关的提案，如“举行蒙古文物展览会案”“建议中央在陕北伊盟速筹设兽疫防治所，以重生产而增强抗战力量案”“尽量吸收知识妇女及边商为本会会员案”“倡导蒙旗妇女发动废除头戴运动案”“建议中央优先成立蒙古文化教育馆案”“建议陕北各中学招收蒙籍学生并请教育部予以优待案”等。<sup>③</sup>在第三届年会上，亦通过了“请总会建议政府登记全国通晓蒙藏回及台湾缅甸语文人才备用案”“请总会建议中央令全国接近边区各省师范学院及师范学校增设蒙回藏文讲座以造就边疆中小学教育师资促进边疆文化案”等。<sup>④</sup>这些提案的指向，表明了榆林边疆学会的研究重点。

榆林边疆学会成立之时，即制定考察边疆社会、研究边疆建设、编纂边疆丛书、发行边疆期刊的规划。按此规划，榆林边疆学会及时启动边疆社会调查，并设计关于内蒙古、榆林、新疆、青海和西康等方向的诸多调查表，其中关于内蒙古的调查表有《绥境乌伊两盟盟旗组织系统表》《伊克昭盟各旗土地面积物产调查表》《绥东四旗暨土默特旗组织系统表》《伪蒙古自治邦组织系统表》《伪蒙古政府负责诸逆姓名表》《伪蒙军队组织表》《伊盟七旗最初王公姓名封爵表》《伊盟各旗境内札萨克及土官调查表》《伊盟各旗参佐领数目表》《札萨克旗境内机关一览表》《伊盟各旗现有学校一览表》《鄂托克旗财政收入一览表》《鄂托克旗军垦调查表》《杭锦旗财政收入调查表》《伊盟七旗山脉分布情况表》《伊盟各旗河流分布情况表》《伊盟各旗沙漠分布情况表》《伊盟人口调查表》《伊盟牲畜调查表》《鄂托克旗盐碱淖调查表》《伊盟各旗召庙调查表》《察哈尔蒙旗畜产概况表》《察哈尔农产概况表》《察哈尔矿产概况表》等。上述调查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交通、人口、气候、宗教等各方面。<sup>⑤</sup>

① 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70页。

② 参见黎圣伦：《创刊词》，《边疆》1941年第1期。《边疆》月刊共编发25期，合印本陕西省图书馆藏。

③ 参见李撼声：《中国边疆学会陕西分会第二届年会记》，《陕北日报》1943年4月25日，第1版。

④ 参见马鹤天：《本会一年来的工作》，《陕北日报》1944年10月22日，第4版。

⑤ 参见马鹤天：《一年来之本会》，《陕北日报》1943年3月28日，第3版；马鹤天：《本会一年来的工作》，《陕北日报》1944年10月22日，第4版。

除上述调查之外，榆林边疆学会还组织了相应的学术活动：

一是组织学术演讲，营造边疆研究舆论和氛围。学术演讲在榆林教育馆、驻军 86 师礼堂等处举办，面向榆林驻军和广大民众。演讲人和演讲主题，有荣祥“历代治蒙杂谈”，马鹤天“中华民族同源考”“伊盟观感”“中国之命运与中国边疆”，黎圣伦“后方人士对于蒙旗常识的欠缺”，陈龙琚“伊盟青年向进步路迈进”，赵尺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本质”，贾宝山“绥蒙教育情形”，徐子梁“西北边情”，王天籁“中央对于边疆政要实施概况”等。<sup>①</sup>

二是创办学术载体，刊载研究文章。如前所述，榆林边疆学会成立后，曾创办《边疆》月刊为会刊。在榆林边疆学会改为中国边疆学会陕西分会、《边疆》月刊迁西安复刊前，共在榆林编印 5 期，刊载 30 余篇文章，其中有马鹤天《抗战三年与边疆》《外蒙与西藏》《蒙地农垦历史的检讨》，杨令德《与王虞辅君论伊克昭盟蒙古问题》，荣祥《应该表彰的俺达可汗》，黎小苏《日本对蒙古之间谍工作》，汪韶九《边疆建设中之交通问题》等。《边疆》月刊迁至西安后，榆林边疆学会又在榆林《陕北日报》副刊设置《边疆》双周刊，共出版 50 期，前 13 期所刊的文章，主要有李撼声《在榆筹设晋陕绥边区大学刍议》、史念海《西北民族问题的另一种看法》、张植初《罗罗忌讳》、赵尺子《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本质》、禹言《鄂托克旗的盐碱调查》、亚文《元代制度概述》、黎圣伦《兴奋与忧急》、颜乘齐《岁首话札旗》、邹焕宇《保卫伊盟和建设伊盟》等，还刊载了马鹤天《延绥揽胜序》《西北与西南》《对于边疆教育的几个提议》《一年来的西北经济建设》等。<sup>②</sup>《陕北日报·边疆》双周刊从第 14 期起目前所见不全，可见之文章有马鹤天《关于建设西北的几个提案》《建设西北必自开发资源始》《中华民族同源考》《外蒙独立于东北收复》等，黎小苏《中国命运与中国边疆》，崔建功《贡献伊盟教育的几点意见》，资料室《台湾北部地理志》和黎圣伦《今后的边疆问题》等。

三是组织撰写和编辑“中国边疆学会陕西分会丛书”。至民国 32 年共征得马鹤天《绥蒙政治经济概况》《蒙藏民族略史》《抗战中的蒙古》《边疆杂咏》和曹颖僧《延绥揽胜》、谢再善《蒙古青史》（汉译）等 6 部书稿。

### 三

榆林边疆学会的存世成果除《边疆》月刊和《陕北日报·边疆》双周刊刊载的文章外，目前所见成果有以下 10 种：

1. 马鹤天撰《大西北的国防前哨伊克昭盟》，发表于《边声》月刊民国 29 年（1940）第 1 卷第 6 期，或为作者派驻榆林之初所作，全文约 6500 字。<sup>③</sup>文章从蒙汉关系、放垦问题、中央政策、商业活动等方面，深入分析影响伊盟战略地位的因素，呼吁加强蒙汉团结、消除民族间猜忌、发展商业贸易、解决好放垦问题等，以巩固伊盟抗日前哨的重要地位。

2. 署察哈尔特派员公署编《察哈尔蒙旗暨各县概况》，民国 32 年（1943）油印本，现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具体执笔人无考。曾在次年《中国边疆》杂志第 3 卷第 1 至 4 期连载。共 8 章，8400 字，章次为总论、政制、教育、交通、牧畜、农垦、矿产、工商等，所述限于 1937 年之前的情况，多为资料转抄，详于各县，略于蒙旗，缺少文化、宗教、风俗等内容。该书或为察

① 参见马鹤天：《一年来之本会》，《陕北日报》1943 年 3 月 28 日，第 3 版；马鹤天：《本会一年来的工作》，《陕北日报》1944 年 10 月 22 日，第 4 版。

② 参见《〈边疆双周刊〉第一至第十三期各期重要目录》，《边疆》1943 年第 14 期附录二。

③ 参见马鹤天著，刘铁程等编：《万里筹边》，第 117—122 页。

哈尔蒙旗特派员公署设立之时（1940年前后）的应景之作。<sup>①</sup>

3. 曾庆锡纂《伊克昭盟概况》，铅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35年（1946）出版。<sup>②</sup>作者曾随新任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朱绶光至榆林工作，对伊盟情况颇为了解。该书共6章16节，约28000余字。章次为概论、土地、人民、政事、物产及交通、改进刍议等。纂者称该书是在外勤人员调查所得基础上，“删订整理，更以实际工作三年又半之经验，略贡管窥，草创而成”<sup>③</sup>。

4. 陈国钧撰《内蒙伊盟七旗社会调查》，民国33年（1944）复写本，现藏中国民族图书馆。其中教育部分曾以《伊盟蒙族教育》为题发表于当年《边疆通讯》第2卷第8期。作者于民国32年以教育部边远区域教育督导员身份遍游伊盟、阿拉善旗及后套地区，颇有所获即成该书。共5章20节，约38000字。章次为总说、民俗、政治、经济、教育等。第3章“绥远蒙旗党务特派员办事处”“绥境蒙政会”“绥蒙自治指导长官公署”“伊盟保安长官公署”“蒙旗宣慰使公署”等记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sup>④</sup>

5. 陈国钧撰《西蒙阿拉善旗社会调查》，民国32年抄本<sup>⑤</sup>。全书共11章54节，约34000字。章次为总说、民俗、教育、畜牧、农业、工业、商业、矿产、盐产、林产、税收等。第2章“民俗”和有关经济方面内容，曾分别以《西蒙阿拉善旗之民俗》《阿拉善经济状况》为题发表于民国33年《新中华》杂志复刊第2卷第3期和中央银行《经济汇报》第9卷第11期。

6. 邹焕宇纂《乌兰察布盟乌拉特中公旗调查报告》，稿本。<sup>⑥</sup>作者于民国24年（1935）毕业于蒙藏政治训练班蒙文班，即奉派为蒙藏委员会调查室驻归绥调查组调查员，后任蒙藏委员会驻伊盟札萨克旗协赞专员。该报告为1937年前后所作，共16项（缺6、9项），约85000字；项次为教育、司法、军事、交通、财政、（缺）、外交、卫生、（缺）、旗政、历史、地理、实业、宗教、社会礼俗、其他等，另有照片若干。“该报告主要记述现状，除历史项的起源与历代沿革利用过《蒙古游牧记》外，其余多本内容来源于旗府档案和调查采访，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中公旗向无志乘，有关记载亦极罕见，而该调查报告记载颇为全面详细，保存了大量第一手资料。”<sup>⑦</sup>

7. 谢再善执笔《伊克昭盟志》（以下简称《志》），署民国边疆通讯社纂，谢再善执笔。执笔人时任伊盟郡王旗国民党旗党部特派员、旗小学教员等。该《志》共上、下2编17章。上编为总志，章次为绪言、鄂尔多斯部之由来、伊盟地理与物产、政治制度、经济情况、教育与文化、喇嘛教、伊盟风土记、交通与卫生；下编为分志，章次为札萨克旗、郡王旗、准格尔旗、达拉特旗、鄂托克旗、乌审旗、杭锦旗、伊金霍洛与达尔扈特。全书约13万字。该《志》曾化整为零由谢再善署名分别发表于民国30至31年（1941至1942）《西北论衡》第9至10卷。民国

① 参见邹卫华主编：《内蒙古地方志总目提要》第二部分《旧方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9页。

② 现收入《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六），远方出版社，2009年。

③ 参见邹卫华主编：《内蒙古地方志总目提要》第二部分《旧方志》，第883—884页。

④ 参见邹卫华主编：《内蒙古地方志总目提要》第二部分《旧方志》，第884页。

⑤ 原抄本存中国民族图书馆，1960年内蒙古图书馆抄录入藏。1987年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和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据内蒙古图书馆抄本铅印，分别收入《阿拉善盟文史》第3辑和《阿拉善盟史志资料选编》第2辑，但“两本均校对粗率，颇有夺误”（参见邹卫华主编：《内蒙古地方志总目提要》第二部分《旧方志》，第892页）。

⑥ 原稿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缺6、9项），内蒙古档案馆存复印件，2007年《乌拉特中旗文史》第二辑《续编》收编。

⑦ 邹卫华主编：《内蒙古地方志总目提要》第二部分《旧方志》，第890—891页。

31年作为“边疆通讯社丛书”之一，铅印300部发行，但现已无从寻觅。<sup>①</sup>

8. 谢再善译《蒙古青史》，系蒙古族编年体史书，著者不详。内容包括蒙古汗系源出、成吉思汗诞生、成吉思汗征伐、成吉思汗之死、忽必烈及元朝诸帝、蒙古可汗退居漠北、清代统治时期、达延汗后代、成吉思汗诸弟后代、卫路特部（额鲁特四部）等。原无章节，谢再善翻译时依次分为3章，每章分若干节，并设置了标题。该书作为中国边疆学会陕西分会研究丛书之一，于民国33年（1944）由重庆中正书局出版。

9. 王九皋总编《府谷县志》，该王为府谷人，早年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曾任山东高等法院院长等。该《志》分首卷、地理、民社、政治、食货、官师、人物、艺文、抗战、大事记、附录，共11卷，约40万字，马鹤天等曾为该《志》作序。<sup>②</sup>

10. 曹颖僧著《延绥揽胜》，作者为陕北横山人，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任陕北联合县立中学（现榆林中学）学监等，民国11年（1922）当选陕西省第三届议会议员，先后任陕西省政府参事、陕北镇守使公署高级咨议、定边县县长、陕北佳宋商税局局长、神木县县长等。他在陕北任职时即游览名胜，悉心考证，集陕北二十余县名山佳川，概延绥地区历史沿革，于民国24年前后纂为陕北《沿革》《揽胜》两编，计15万余字，《沿革》为陕北历代沿革共11章，《揽胜》为名胜、古迹、山原、河流、关险、寨城、桥梁、祠祀、陵墓、水利、边防共10章。后以《延绥揽胜》之名被榆林边疆学会征得，列为中国边疆学会陕西分会丛书之一，于民国34年由史学书局出版。

#### 四

抗战时期榆林边疆学会在马鹤天的领导下，取得了一定学术成就，特别是从榆林中国边疆学会到整合后的中国边疆学会陕西分会，能够坚持在抗日前线关注华北和西北边疆问题并组织开展研究，体现了研究为抗战服务的直接目的。如前所述，榆林边疆学会集中于华北和西北边疆问题研究，有明显的区域性特点，与中国边疆学会重庆总会、四川分会关注西南和东南边疆研究，共同构成了当时中国边疆研究的整体性、全面性格局，体现了榆林边疆学会独特的学术地位。这是榆林边疆学会的突出特征。

除此之外，榆林边疆学会的研究及影响，还有以下特点，其中亦体现了马鹤天的引领作用。

一是研究边疆以调查收集资料为先，进而整理成文。这与马鹤天早年考察边疆的学术习惯以及参与的工作任务相关，在马鹤天的倡导下，设计了前述的诸多调查表，通过深入观察，进行调查记述，记录较为翔实，避免了好古考据之癖，体现了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与思考，也体现了马鹤天及其参与者边疆问题研究的指向性。同时，在马鹤天的引领下，榆林边疆学会注重联系国内与国外形势、中央与地方关系、蒙汉民族关系等，能够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的联系中发现问题，提出相应对策。这主要体现在榆林边疆学会组织的学术演讲和相关提案中，如《历代治蒙杂谈》《后方人士对于蒙旗常识的欠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本质》《中央对于边疆政要实施概要》等演讲，“建议陕北各中学招收蒙籍学生并请教育部予以优待案”“请总会建议政府登记

① 1965年台湾“蒙藏委员会”据国民党中央党部存本，并请时任榆林边疆通讯社社长赵尺子作序再版，但颇多错讹。1985年伊克昭盟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将此本（即赵尺子作序本）收入《鄂尔多斯史志研究文稿》第六辑，但未作精校。2009年远方出版社以1965年台湾“蒙藏委员会”印本为底本，以《西北论衡》本（缺第10卷第3期）校补，收《内蒙古历史文献丛书》之六中再行出版（参见郭卫华主编：《内蒙古地方志总目提要》第二部分《旧方志》，第883页）。

② 该《志》于1943年以麻纸石印刊行，所存因时久磨损，字迹多有不清，2019年经府谷文库编纂委员会整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全国通晓蒙藏回及台湾缅甸语文人才备用案”等提案，这些研究指向和学术思考，不是孤立地而是在联系中认识边疆问题。

二是榆林边疆学会的研究，以马鹤天一贯倡导的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为重心。马鹤天早年即倡导国人关注边疆、研究边疆、开发边疆，在他的倡导和引领下，学会诸人研究涉及边疆危机、边疆移民、边疆交通、边疆资源、边疆文化教育等方面，学术思考的重心或提出的建议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各领域，特别是强调边疆文化教育和实现蒙汉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其所遗成果，几乎都是围绕上述重心编述。在边疆研究中，马鹤天特别重视和提倡对当地史志的利用，并鼓励进行史志性的研究与编纂。他于民国32年为新修《府谷县志》作序时，即总结自己之前考察活动中对史志的重视：“余二十年来，周游四方，考察边塞，东北如辽吉黑，西北如甘宁青外蒙，西南如川康藏边，每至一地，辄先搜摭志乘。三年来前榆林，广求陕北各县新旧志，以备研究边疆之参考资料。”<sup>①</sup>《延绥揽胜》出版时，马鹤天专为之作序称：“留日学友曹颖僧先生，富藏图书，博稽群籍，自明代世居横山，对明代及沿边掌故尤有深切研究，撰成《延绥揽胜》一稿，于历史沿革、地理变迁、古迹胜境、名人大事、以及风俗民情等等，无不旁征博引，广事搜罗。略读一过，觉其取材之丰，得未曾有。”<sup>②</sup>《蒙古青史》出版时，马鹤天亦为之作序，称其“当为蒙人所著，以蒙人而著蒙事，实为不易之珍本”。<sup>③</sup>其中足见榆林边疆学会之研究对地方史志的重视。

三是在马鹤天的倡导和带领下，以榆林边疆学会为中心，在榆林出现了多个松散的边疆研究学术团体，使边疆研究成为当时榆林难得一见的学术景观。这些学术团体主要有由荣祥主持的伊金霍洛蒙旗青年社和由《大公报》特派员兼记者杨令德主持的塞风社<sup>④</sup>。前者亦有蒙汉文对照不定期的《蒙旗青年》，后者亦有不定期的《塞风》杂志。特别是塞风社，在榆林边疆学会会刊《边疆》月刊未创办前，在马鹤天等学人的建议和组织下，于民国29年编辑出版《抗战与内蒙古》（塞风社丛书之上）一书，由邓宝珊将军题名，其中收马鹤天《中国少数民族问题与中国国民党政策》、荣祥《从汉蒙同源说到精诚团结》、汤昭武《论对蒙工作》、谢再善《日寇侵略蒙古阴谋的失败》、邹焕宇《从蒙旗组织说到“伪蒙政府”的没落》等文章，或是榆林边疆学会未创会刊前，相关学人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

总之，作为一个诞生于抗日硝烟中的学术团体，榆林边疆学会尽管有确定的官方背景，但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学人在边疆危机刺激下的忧患意识，所遗研究成果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深入挖掘马鹤天及榆林边疆学会的历史沿革、人员构成、活动情况、重要成果等，对于丰富相关史志编纂内容有重要价值，对于完善20世纪40年代前后中国边疆研究学术团体的研究亦有重要学术意义。

（作者单位：西安培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责编：周全

<sup>①</sup> 府谷文库编纂委员会编：《民国府谷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7页。

<sup>②</sup> 榆林市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市志》卷28《附录·史志序跋·〈延绥揽胜〉序》，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848页。

<sup>③</sup> 马鹤天：《青史序》，《边疆》1942年第8期。

<sup>④</sup> 杨令德于1937年至榆林任《大公报》驻榆林记者、战时特派员，曾两度兼《陕北日报》总编辑，于1938年组织塞风社并创办《塞风》。